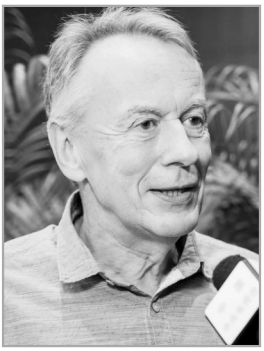


(上接第10版)

拉格纳尔·鲍德松：我翻译的《论语》译本注解比正文多



拉格纳尔·鲍德松 曾任冰岛驻华大使馆公使参赞、副馆长。长期从事中冰翻译，译文忠实于原文，准确鲜活，易于理解和表达。深入研究中国，向冰岛和其他国家人民讲述中国故事。主要译作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冰岛文版，以及《论语》《道德经》。

在第17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上，新晋获奖者拉格纳尔·鲍德松备受关注。他有许多身份：上世纪70年代首批到北京大学留学的外国学生，冰岛驻华大使馆前公使参赞、副馆长；他还是“中国通”、汉学家，是把《论语》翻译成冰岛语的第一人，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岛文版的译者。

“我年轻时来到中国，发现这里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鲍德松刚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很多课程听不太懂，不仅是语言层面要理解，更因为有思维模式的差异。“后来我把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反复读了好几遍，才开始初步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鲍德松以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为切口，一点点探索着全新的思维体系 and 世界观，也自此开启了对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

此后鲍德松到日本东京大学交流学习中国哲学。“我发现，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翻译去作全面透彻的研究”，鲍德松自此开始翻译《论语》冰岛语译本。“仅是字面翻译远远不够，还要在前言中解释‘道德’‘仁义’‘君子’等基本概念，在正文中添加详细的注解，最后注解可能比我翻译的正文字数都要多。”翻译完成后，鲍德松很快找到冰岛的出版社出版了《论语》译本，据他回忆，“《论语》冰岛语版卖出了几千册，再版2次，那时冰岛全国人口还不到30万，这看来算是不错的成绩。”

1995年，冰岛在中国设立大使馆，鲍德松被委

派赴华参与使馆筹建。此后，他在外交官的岗位上坚守了25年，也在工作之余翻译完成《老子》冰岛语版。从翻译儒家思想经典到翻译道家思想名作，鲍德松认真查阅了许多资料，“《老子》(或称《道德经》)是全世界被翻译最多的图书之一，光英文就有几十个版本，在中国不同时期对《老子》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解与思考，也在翻译一部部名著的过程中不断加深。“春秋时期的‘孔孟之道’、法家的‘道’，在翻译时可以理解为‘主义’(英文-ism)，但想翻译好道家的‘道’非常难，其他语言中没有相似的概念，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鲍德松又解释说，“比如书中的‘道可道，非常道’指的是世界是变化中的世界，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对它的理解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在翻译时，要添加详细的注释，解释的不只是词义，更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022年10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岛文版正式首发，鲍德松担任著作主要翻译。为保证翻译准确、优美且通俗易懂，鲍德松在翻译时反复查询和对比了中文版和英文版图书。“比如书中提到年轻人应该有‘信仰’，英文如果翻译为belief并不十分贴切，其实中文原文指代的含义更贴合‘理想’这个词，这是我自己翻译的过程中摸索到的。”

从《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典籍，到如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重要著作，鲍德松发现通过国家治理造福人民的思想一直在书中延续着。鲍德松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在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向富裕、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历史上对人民价值的强调在他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包括实现脱贫、倡导和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没有类似全面的政治战略和决策介绍。中国这些年在‘脱贫’‘反腐’‘工业化’等方面的进展充分体现了‘中国速度’，令人惊叹。我竭尽全力将他的话简明扼要地翻译给冰岛读者，让他们理解文字背后的含义。”

谈到下一阶段的计划，鲍德松说，国外还存在一些对中国的误解，他想以西方视角为外国人写一部介绍中国的书，谈谈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立足中国国情、区域特色和“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等理念，集中探讨国外机构到中国投资的市场环境和有潜力的发展领域。

吴秀卿：为中韩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吴秀卿 历任韩国汉阳大学中文系主任、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韩国中国语文学会会长。多年钻研中国戏剧及中韩戏剧文化比较研究，出版中韩文著作、论文、剧本翻译共150余部。主要译作有《中国古代剧史》《雷雨》《茶馆》。

第17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之一吴秀卿是韩国汉阳大学名誉教授、历任韩国中国语文学会会长与韩国演剧学会会长。为了让中国图书和戏剧走进韩国人的生活，她和团队做了很多工作。通过中国戏剧朗读演出活动传递中国作品的“味道”与价值。谈到此次获奖，她开心地表示：“这次获奖是对我和团队极大的鼓励，非常感谢主办方。”

据吴秀卿介绍，她在读高中时就对中国文化和图书产生了兴趣。原本学习法语的她在上大学后，因个人兴趣选择了中国文学专业，在此期间阅读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参加了大学戏剧社团。大学毕业时，她选择了关汉卿的《窦娥冤》作为毕业论文研究方向。“自此，中国戏剧研究和翻译成为我的本业。”她说。

吴秀卿的翻译成果主要为两类，一是学术研究著作，二是文学作品。学术研究方面，她有部翻译代表作，分别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史)》和廖奔的《中国古代剧史》。她认为，《中国古代剧史》对于帮助韩国学者深入了解中国戏剧史和文化有着极高参考价值。文学作品方面，她简要介绍了老舍的《茶馆》和曹禺的《雷雨》翻译过程，她认为，这两部经典之作需要被高质量地翻译出来，“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挑战”。

2018年，吴秀卿在韩国召集了中国戏剧专业的翻译团队、评论家及导演，创立了韩中戏剧交流协会。提及协会创立初衷，她分享了这样一段经历，“韩中两国建交不久，1994年中韩日戏剧机构共同创立了BeSeTo戏剧节，是三国轮流举办的戏剧节。我参加并负责中国作品的翻译及交流调整工作，这20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也让我感到更多优秀的中国作品应该被推介到韩国”。她与团队一起挑选优秀的中国戏剧作品，做高质量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如“中国现代戏剧”丛书和“中国传统戏剧”丛书目前已出版了45种，之后再将这些翻译作品提供给适合的导演做朗读演出。她希望将中国好的剧目搬到韩国的舞台上，让韩中两国观众相互理解，进一步推动两国间合作。目前中国戏剧朗读演出活动已举办7届，共演出了23个剧目，活动效果非常好。在谈到目前协会工作的难点时，她表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找好剧本比较困难，希望中国专家学者可以向我们推荐一些好作品，并建立韩中两国交换剧目的平台；二是获得资助比较困难，在韩国国立剧团的

支持下，我们在明洞艺术剧场举办活动，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之后希望可以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将更多优秀的中国剧作推介到韩国。”

由于疫情，吴秀卿已经很长时间没再来北京。提到此次北京之行，她表示：“我见到很多朋友，他们一直鼓励我研究和推介中国戏剧，让我感到非常温暖。”第一次来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她感受到图博会现场的热闹氛围：“我在艺术书展上看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精美图书，感受到中国艺术书的悠久历史及魅力。希望下次来北京可以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参观学习。”这次她还在BIBF活动上遇到了作家刘震云，“他向我推荐了其作品《一日三秋》，希望我能担任这部书和剧本的翻译工作”。之前吴秀卿就已翻译过刘震云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她说：“我非常喜欢刘震云的作品，戏剧《一句顶一万句》在韩国演出非常成功。”

对于之后的中国图书翻译，吴秀卿介绍：“最近我正翻译南戏的《五伦全备记》，是明朝时期从中国传到朝鲜的一部中国戏剧。我之前在中国发表过很多关于中国戏剧的论文，因此想将这些文章整理出来，出版一部韩语图书。”从事中国戏剧研究和翻译工作已有40多年的她有着独到的翻译理念，她认为：“翻译是再创作，见书如见人，译者需要了解作家，有了灵魂的交流，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作品深层次的含义。同时，译者要有一定的语言功底，对待任何内容都要谨慎。”

●书评

百件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

○聂震宁

由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纂、郑茜主编，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以下简称《何以中华》)一书，通过100件文物，描绘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展示了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历经一代代王朝更迭，却从未割断文化根脉，回答了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何以经历几度南北对峙和分裂，却总能再度聚合，一次又一次重新走向更高水平的统一和更加紧密的交融聚合。通过100件文物，此书解读了“大一统”价值观何以能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使得各民族即使面对历史上的各种分裂力量仍能凝聚不散，最终发展成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何以中华》一书精心遴选出100件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分为“中华民族的孕育与起源”“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等篇章，从实证了中华大地超过百万年人类生命史的“元谋人上门齿化石”说起，到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矗立，描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汇聚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历程。

《何以中华》一书依托中国民族博物馆长期开展的重要学术工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以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为线索，寻起源、塑共识、见精神。这部书始终贯穿着叩问与探索，讲述了中华民族如何从涓涓溪流到汇成江河，走过了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虽然主题恢宏，但书中每一个向历史深处发出的叩问都可感可知，指向实处。

花、华山、华夏，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中华民族的称谓来自何处？瓶身绘制着抽象的玫瑰花图案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既向我们展示了仰韶文化盛开在华山脚下的玫瑰花的形象——它们有可能是中华民族以“华”为名的来源，又向我们提供了华夏文化和古羌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见证。

“封狼居胥”为什么被古代武将视为最高荣耀？“马踏匈奴”石雕是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历史事件的重要纪念和象征。在北击匈奴的数次决定性战役中，“西汉第一战神”霍去病所展露的卓越军事才能和建功立业的豪情，书写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一章；在他所驰骋的疆场和所向披靡的战役背后，奏响的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发生正面交汇与历史碰撞的宏大交响乐章。

南北朝有多少古代民族融入了汉人之中？徐显秀墓壁画展开的是南北朝时期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社会面貌。南北方族群在文化和血缘上的融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迎来了此后的大统一和大繁荣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何以中华》书中每一个从文物严谨探寻得出的答案都在不断解答、丰富着“何以中华”这个主题，展现着



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历史传统的深厚根基、文化创新的珍贵宝藏。全书依据丰富翔实的鲜活史料，科学严谨的阐释技巧、图文并茂的展现形式，独具匠心，使点具有代表性，以点连线，使线具有延续性，点、线成面，使面具有经典性，通过点、线、面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渐渐清晰。而“何以”的探寻之旅，将在“这就是中华”的深刻领悟中到达终点。

此书在具体内容的写作和编排上，作者和编者都有精心设计。100件代表性文物，每件文物自成一章。开篇有一个概括性的“文物简读”，让读者对这一文物先产生感性的认识，为正文部分的深入介绍作了很好的铺垫。书中的文物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历史事件、人物故事、社会变迁等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述网络。这种“物”“史”互证的叙述方式，使得读者能够在空间和时间的交错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和文物的生命力。正文部分对文物的介绍，不仅仅停留在文物本身，而是延伸到了相关的外形研究、成果等，还介绍了中华民族的龙崇拜、中华民族“龙的传人”身份意识的来源极其丰富内涵。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知识，但非专业读者读起来不会觉得乏味难懂。全书语言通俗易懂，概念清晰明了，用鲜活的例证和生动的讲述，将专业的学术理念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信息，对于普及历史知识和推广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读者而言，能够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阅读、了解如此内涵丰富的承载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程的文物谱系，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相信，对于“何以中华”的追问，将经由阅读而抵达读者的心底。

《何以中华》堪称一部优秀的通俗理论读物。它以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为广大读者打开了一个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新窗口。这部书不仅有助于增强大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贡献。

(作者系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

心中有爱 笔下生情

○贺绍俊

《阿娜河畔》的叙述非常好，绵软、温润，如同细针密线，看不出什么破绽。我首先是被阿舍的叙述所吸引了。比如阿舍写成信秀第一次来到明家时，她这么描写写成信秀的外貌，“写成信秀皮肤光滑，眉眼匀称，模样标致耐看。”这还只是标准化的描写，接下来通过明双全的眼睛看过去的情景，“第一眼看似端庄，第二眼看似凛然不容侵犯，第三眼看过去就是湿润和善，眉毛、双眸、鼻梁、嘴唇、脸型极其恰如其分地聚在一张面容上，又极其恰如其分彰显着个性，让人觉得这样的脸不是最美的，却是最好的”。这段描述看上去在形容一个人，其实这里她写到两个人，除了是在写成信秀，还写到了一个看成信秀的人，因此阿舍在后面补上一句“明双全坐在矮凳上，瞥了一眼写成信秀，赶忙将目光收回。”这句话不但写明了双全的心理，而且再次写到写成信秀的美，这个美让一个男人不敢正视。

从这个细节看出，这部小说的叙述非常好。长篇小说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因此讨论长篇小说往往会从“大”来着眼，主题有多宏大，内容有多丰富，人物塑造有多成功，等等。这些固然重要，但是大工程都是靠一个一个小细节搭建起来的，细节如果粗制滥造，不仅让大工程经不住人们的仔细观察、欣赏，而且很有可能会导致大工程的整体倒塌。这就是我首先要特别强调《阿娜河畔》细部的缘由，这种细针密线般的叙述让阿舍建构的宏大工程非常坚实。这是这部小说成功的首要条件。

《阿娜河畔》写了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农场建设发展史，但是我更愿意将这部小说看作是一部爱情小说。

小说写了两代人的爱情，这两代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我将其称为胜利后的革命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人们从革命转向建设，他们是以革命的精神投入到建设之中的。因此这是一个高扬革命理想，强调革命信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爱情不再处于神圣地位，屯垦戍边、进行艰苦的大生产才是他们的主要生活内容，人们因为紧张的劳动而将个人的情感需求放在一边。但是作者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埋下了一颗爱情的种子，小说写了这些爱情的种子在那个不受待见的年代里如何破土发芽。

小说写了数对让人感动的爱情。比如明双全与李秀琴，石永青与写成信秀，许安然与写成信秀，明中启与石昭美、楼文君，这些爱情故事几乎没有一个是在重复已往的故事套路，这一点特别让

我佩服。写爱情故事往往会有一些套路，但是我读阿舍的这些爱情故事几乎没有一个是重复以前的故事套路。比如：以往的故事套路会写革命胜利后的干部怎样休掉家乡的原配，娶了年轻美貌的新妻。但是阿舍却写的是——明双全在边疆开了2年荒后，将家乡的原配李秀琴接来边疆；也写了许安然在与家乡完全失联的情景下，并不轻率地接受写成信秀对他的喜爱。小说展现了爱情的另一种风景：在那个胜利后的革命时代里，爱情虽然没有浪漫的光环，却有着黄金般的重量。这种重量是由一个人的精神信仰带来的，那是一个崇尚信仰的时代，阿舍发现，除了革命信仰，那个时代的人们同时也将爱情当成一种信仰。阿舍非常敬佩那时的人们把爱情作为一种



信仰，她以诗意的文字讴歌了以信仰的方式去追求爱情，可以说这就是小说最重要的主题。

胜利后的革命时代有着今天年轻人不懂的爱情，阿舍将这种我们今天年轻人不懂的爱情书写得绚烂至极，而小说又结束在明中启一家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就像小说写的，“中午的光线亮堂堂，暖融融的，家里安静极了”，这样的描写可以用古人的一句话来概括：“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爱情从热烈到撕裂到弥合，再到归于平淡，可以说是到达了爱情的最高境界。

当然，这部小说虽然写爱情，但它不是个人的情感史。爱情本身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小说人物将爱情作为信仰，这与他们的革命信仰是相通的，这就决定他们的爱情故事和他们参与的革命故事交织在一起。

阿舍个人的姿态和情感，特别是她的世界观，是与她小说中的人物相一致的，这是小说成功的关键。就是说，阿舍不仅认同把爱情作为一种信仰，而且我相信她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爱情的。